

一部詩人靈魂的自白書

瀛苑副刊

■ 文\圖 陳峻毅 (英文二C)

莎翁十四行詩的世界，充滿了神秘與坦承、唯美與醜惡，它透過對人生痴愚的悲嘆、剖白，道破生命美好的希望與智慧；它既像是詩人向讀者告解的自白書，卻又處處迷漫著欲訴還噤的秘密，留待世人的疑猜與諒解……。

要進入莎翁十四行詩的世界，必須先揮除圍繞其外，屬於歷史、社會、文化、宗教與作者（詩人）本身的迷霧。文藝復興，一個文化輝煌的時代，一個人本主義的時代，亦是一個政治戰勝宗教、人的世界壓過神的世界的時代；在此同時，大不列顛世界亦臨到了歷史的大轉捩點。一四八五年，經過了三十年的紅白玫瑰戰爭，屬於紅玫瑰（即Lancaster家族）的亨利七世殺了白玫瑰家族（York）的李查三世，又娶了York家族的女兒，以這樁染血的紅白政治聯姻結束了英國的內戰局面，開始英國史上最強盛的都德（Tudor）王朝，這也是英國走向世俗文化的開始——亨利八世在位時，英國脫離羅馬教庭而改宗英國國教派，Thomas More因力抗君意而遭亨利八世處死。伊莉莎白一世時期是這世俗又繁榮時代的高峰，不列顛的子民們沈浸在勝利的美夢中，女王手下的朝臣和御用文人——如Sidney & Spenser（筆者在此要不客氣地說）——則致力於宣誓對女王的效忠和謳歌時代的宏偉和國運昌隆；在這樣令人雀躍的時代氣氛中，莎士比亞，這位雅芳河畔的吟遊詩人，卻嗅出了高處不勝的寒風和大英帝國由盛轉衰的悲劇預言氣息。

經歷了歷史劇和喜劇時期，莎翁成就了自希臘時代以來最高的悲劇事業——以一位悲劇詩人的身分成為文學巨人——，歷經嘻笑怒罵的歲月，一位詩人在其心靈中凝斂出智慧的詠嘆；而他的十四行詩，就同他的劇本一般——從前期對生命的熱戀和對友情、愛情的讚頌，到中期對世間一切無常的感嘆，乃至後期痛定思痛之後對人生的大徹大悟，在在令人覺得莎翁之十四行詩實乃人生一幕幕的小劇場，甚者，品味其十四行詩其實正是掌握莎翁悲劇元素來源的最佳途徑——充滿了詩人對世事的透徹了然。他對人性的肯定是透過懷疑達到的，在歷史劇中他表達了對政治的體察和對政權的不信任，揭露了英國安定繁榮的王朝背後宮闈內的血腥鬼影（雖然偶爾歌功頌德一下）；喜劇中的笑鬧其實暗藏對人事的嘲弄與諷刺；而悲劇的深沉流露的是詩人對俗世道德、人倫關係與外在信仰的質疑，與對人類追求超越命運的內在意志的強烈肯定。

那麼，這一首首十四行詩呢？它們或許就如同詩人自傳式的內在對話，告白了某些私生活層面，詩人對於個人感情世界的自省和懷疑——懷疑美好事物的永久性。

就考證上而言，我們的確應該對詩與詩人現實生活的關聯性存疑——這些詩是為何而寫？寫給何人？詩中的Speaker又是否就等同於詩人自己？詩中的角色是否存在，又指涉何人？不勝枚舉——然而，即使這些文字有某些部份，甚至全為虛構，我們都能確定詩行 那些發自內心的真情感，以及其中對朋友、愛人與整个人生的傾訴言詞，必然來自詩人自己的某些親身體驗和人生經歷之觀察；因此，將這百餘首十四行詩視為詩人的心路歷程，在某些程度上並無不可。

就筆者個人的看法，我們應從「十四行詩是莎翁悲劇作品辭藻和劇情靈感的來源與沃土」這個方向看待十四行詩。要知道，在西方的觀念，只有最好的作家能成為詩人，只有最好的詩人能成為悲劇詩人，而悲劇，也必然只能誕生於一顆真正最詩人的心靈；我們同時知道，除了那些劇本外，莎翁以詩體傳世的最著名作品，便是其十四行詩集，因此，觀讀詩篇 詩人心境的轉折和人生態度的改變——從樂觀轉為疑惑，疑惑而陷入悲觀，再從悲觀重拾希望——，就如同去體驗莎翁由喜劇到悲喜劇再到悲劇的心路歷程一般。再者，一六〇一—九年是莎翁的悲劇時期，而一六〇九年正是十四行詩初次刊行時間，可想而知，這個詩集極似詩人在交代其悲劇靈感的現實來源。

十四行詩共一五四首，其中涉及三個重要人物：詩人，詩人的朋友，以及一位現在被稱為「黑夫人」的女士。一—一七首寫的是「勸娶妻生子之十四行詩」，可能是寫給友人的，願朋友「讓美在你的兒子或你身上永活」，又有「你若有個兒子在人世，你就活兩次：在他身上，在詩。」等句。一八至二六首寫詩人開始與朋友交往，許多批評家便是從這些詩句上認定莎翁有斷袖之癖，因為這其中有太多以「愛」代稱友情和對性愛描寫的詞句，如：「造化造你既專為女人愉快，那麼讓她們享受，而我佔有，你的愛。」詩人宣稱他的作品可使他朋友永垂不朽。二七至四七首寫詩人遠遊，友人與黑夫人發生曖昧，詩人責其不義，使之羞愧流淚，詩人恕之；然至四十首，友人再與黑夫人私通，於是詩人加以曲諒，認為黑夫人之誘惑難抵禦，而詩人坦承其與友人異體同心，對黑夫人之對兩者示愛並無芥蒂。四八至六六首寫友人之不忠與人生無常，致使詩人焦慮沮喪。六七至一〇八首寫自我懺悔後又和朋友書信往來。六七—七〇首勸友人慎交遊；七五—九九首寫諫言未被採信，苦惱徬徨；一〇〇首寫心情一變，與朋友言歸於好；沈醉於友情中。一〇九—一二六首寫詩人向友人解釋，友誼幾被黑夫人離間，但彼此心意堅定，友誼仍可恢復，永久不渝。一二七—一五二首是寫黑

夫人的事，又像致給那位朋友的，可分三段：一二七—一三二首寫起初之半戲謔態度。讚美她的黑皮膚和琴藝，未知其與友人之私情，於是讚頌其美，唯恐失寵；一三三—一四二首寫黑夫人二度不忠，但仍不能忘情於她，衷心苦楚，一四三—一五二首將黑夫人形容為一捨棄嬰兒而追逐雞群的主婦，向其求寵，而詩人自知為情所困，然最後大夢初醒，毅然與她決絕，劃清界線。關於一五三與一五四首則尚未考證是否真為莎士比亞所寫……。

有些攻讀莎氏悲劇的學者認為，比照十四行詩的寫作時間，可以論定莎翁之進入悲劇期與黑夫人和詩人之關係惡化有直接關係，因其使詩人心情陷入黑暗。此說有失客觀公允，因為還有二大可能因素也是導致莎氏悲劇期的關鍵：一為原被女皇寵幸之大臣 Lord Essex 於一六〇一年被處死，使莎翁感到國家局勢之不安，而莎翁與其他詩人不同處正在於其對政治的高度洞察力，於是，詩人的悲劇靈魂就這樣被敲醒了。另一個可能則應以詩人本身內在思想的轉變，與詩人自己所見文藝復興人本主義的過度泛濫致使人類以自我為中心的過度膨脹，加上文藝復興時代的由盛轉衰，這才能解釋其悲劇期的肇始因素。

其實，即便詩人不會因一個女人而使創作發生根本改變，亦不表示我們不能從詩集中找到悲劇伏筆，或許，兩者是恰恰相反地關係密切；更何況上述的悲劇期三大肇因其實是在莎翁的詩集 同步地作用著，使詩中描寫的心情和劇情逐漸演變著的。筆者有一種假設，即：我們是否可以將十四行詩集 的詩人和朋友視為詩人的兩個自我，而黑夫人則指涉為對伊莉莎白女王的反諷（女王是純白的處女形象）。則如此一來，我們可將十四行詩解讀為另一種君臣倫理（Courtiership）的矛盾，即從喜劇期到悲劇期這個探討人世、追求文學與道德合一的理想化自我（詩人），與寫歷史劇、談論政治、迎合都德王朝史觀、歌功頌德又意氣風發（善調情而俊美）、俗世而多產（故詩人勸朋友生子）的作家自我（詩人的朋友），在面對整個時代、王朝乃至女王——國家的象徵——時，所產生的自我矛盾。究竟該與逢迎朝政的自己劃清界線完全斷絕，還是讓理想與現實妥協合和為一？到底該鍾愛國家，忠於王朝和女皇；還是忠於歷史道德和理想？詩人也許到最後決定讓洞悉政治、具世俗智慧的自己，與深思人性黑暗、探索道德信仰具出世智慧的自己相結合，然後擺脫當世的政權與宗教文化主流的影響（與黑夫人決裂），昂然而痛定思痛地走向質疑現世的悲劇世界。

或許，我們應該將問題簡明化。即透過十四行詩，我們了解了一代詩雄其靈魂深處內在精神的演變。像希臘時代那些真正的詩人——悲劇詩人——一樣，莎翁的確是不落

世俗，且抱著憂患意識在反思盛世中的危殆與不安的。他不似當時的詩人或作家，他像馬羅 (Christopher Marlowe) 一樣，寫劇本不寫美好的Romance來暗示時代繁榮，反而寫下對人類過度自信的反省和焦慮，但這反思並非透過宗教，而是透過人類意志。從他的十四行詩，則可見其詩亦不若其他詩人，盡是著眼形式與不合宜的迷戀情詩，而是對自我情感，以及對友情、愛情、引申而為時代的省察與自我撻伐。這些詩句表露的是深沉的情感，是痛苦也是歡欣，是猜忌亦是體諒，是疑惑卻保有人性的希望，是激情但又表現詩人心靈的成熟。

只有真正的詩人寫得出悲劇，所以亞里斯多德 (Aristotle) 寫的詩學討論的不是詩，而是悲劇。正如同莎翁的十四行詩集，即使我們拋開那煩人的考證資料，只將之視為由一五四首短詩集合成的故事，亦一樣使讀者體認到深刻的人性真實，那三位男女彼此熱烈而糾葛的情感衝突，那詩人與友人表現出的高貴友情，與詩人歷經掙扎和磨難之後，對人生與人類情感發出的睿智宣言，在在表現悲劇作品獨有的人性尊嚴。

